

二月二：春天的节日

张 勃

二月二,又叫“龙抬头”“青龙节”“雨节”等,虽不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地位显赫,却也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二月二成为节日大约始于唐代,元明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俗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春天的节日,其文化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对农业丰收的企盼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二月二时处仲春,是春耕生产即将全面开始的季节,其许多节俗活动便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展开。

填仓是二月二最重要的习俗活动之一。仓囤是储存粮食的地方,二月初二一大早,人们会用灰画成大大小小的仓囤,有的囤外再画上梯子,以表明囤的高大。打灰囤时往往还要念些口诀,如“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等。填仓活动中往往还有占岁的做法,人们会在画好的仓囤中挖一小坑,将谷子、豆子、玉米等各种粮食放置其中,埋好,几天后看哪种先发芽,以此判断各种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其中包含的仍然是对丰收的关心和热望。

风调雨顺是农业丰收的前提和保障。在民众心目中,龙是司雨的神,秋冬之间往往潜入水中蛰伏不出,到春天才会醒来。要想让龙行云布雨,首先就得将它从睡梦中唤醒。所以一些地方的人们在二月二一大早就用棍棒击梁头,以敲醒他们担心还在沉睡的龙。为了让龙顺利抬头,愉快升空,人们还千方百计地讨好龙,把水饺叫龙耳,把春饼叫龙鳞饼,把面条叫龙须面等,并举行一些祭祀活动。

另外,人们还往往在二月二试犁、种菜、饭牛,从而使其成为农事生产开始的标志性时间。这些节俗活动虽然形式有别,但无不包含着人们对于农业丰收的强烈企盼。

“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蝎不上身”:对人身康宁的热望

俗话说:“立春三日草芽青,惊蛰一过虫子生。”那些出动的虫

子(有时也包括野兽)不仅会危害庄稼,也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侵扰。由此,在虫子初生的季节通过一些特殊的活动以消灭它们,就成了二月二节俗里十分重要的内容。

明清以后,二月二撒灰除虫已相当普遍。人们把灰撒到墙边、门框、香台等处,撒边唱一些歌谣,如“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蝎不上身”等,这些歌谣明确表达了撒灰的动机所在。除了撒灰外,驱除毒虫还有多种方式。其一便是把二月二的各种饮食活动都冠以驱虫的名目,比如河南一带把摊煎饼叫“熏虫”,陕西西米脂一带把吃黄米馒头叫“咬蝎子”,山西芮城一带吃油条叫“咬蝎子”,山东一带把炒豆子叫“炒蝎子爪”。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一些行为方式还在一些地方被解释为驱邪避瘟、不得疾病的手段,比如山西永和撒灰时会撒成弓箭的模样,意在驱除邪气。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二月二要吃“撑腰糕”,俗信吃了可以强筋壮骨,不腰痛。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沙河沟村,人们还用高粱秆串成“龙尾”缝在孩子的后衣襟上,令其连续佩带三五日,以辟邪驱凶,令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

“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对生活富裕的追求

人生在世,无不希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迎富”作为二月二的节俗活动在唐朝已经出现,近代仍有流传。比如不少地方,尤其是山西一带往往把二月二的引龙叫做“引钱龙”,举行仪式时一定要用钱。又如山东定陶一带,二月初一晚上,人们会在屋里挖一小坑,将几枚钱埋进去,若不挖坑就用瓦片盖上,到第二天早上,由小孩子扒出来。俗信这样做可以引来钱财。

“二月二,接宝贝儿”:社会关系的协调

在许多地方,二月二还是社会交往的特定时间,其中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是相当普遍的做法。吴素园曾撰写一首《扬州竹枝词》:

“二月初头祀典重,土地祠壁彩泥封。女儿尽作归宁计,响屐香车处处逢。”可见扬州二月二接女回家习俗在清朝时已十分盛行,而这并非特例。在封建社会里,回娘家是对女子与娘家人因异地生活而积聚的思念进行疏通的渠道,是出嫁女儿对原有生活空间和原有社会网络的回归,也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同时,它还是外甥与舅家确认和强化关系的方式,是具有姻亲关系的两家人互相交往、密切关系的途径。一句话,出嫁女子回娘家,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维护和强化,二月二回娘家也不例外。

当然,二月二协调的社会关系并不止于基于血缘和姻缘形成的,还有基于地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在许多地方,虽然家家都会摊煎饼,或者炸糖糕,但还是要把自己家的送给别人家,从而形成一个社区内居民互相馈赠的现象。这种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和礼尚往来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是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二月二,不干活,坐下来,吃大馍”:享受休闲生活

二月二也是民众休闲的时间。许多地方的二月二都有禁忌,如不能动针线,不能用刀剪,不能用磨,所有这些都不能让二月二成为一个合法的非劳动非工作时间的,对于整日与针线刀剪打交道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这一天,她们携子将雏,有的可以回娘家,有的可以到郊外踏青。

许多地方在二月二开展有组织的活动,也为民众提供了宽广的休闲空间,其中庙会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二月二都有庙会,像甘肃岷县秦许乡过会必唱三天四夜大戏,庙会上有套圈、青蛙游戏等各种好玩的游戏。广西贺州黄田祀神庙会上有舞龙、舞狮、唱戏、抢炮等活动。人在庙会中,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身之所历,甚至鼻之所嗅,舌之所尝,无不异于平日,而所有这些,也都为身处其中的民众带来了身心愉悦的

感受。

“落了天灯好上工”:年节终了的标志性时间

年节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其序幕自腊月初八拉开,到二月二才最终落下。可以说,二月二是年节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是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从此人们要停止以娱乐消遣、社会交往、祈祷神灵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步入日常生活、生产的常态。各地流传的一些习俗活动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在江苏盐城,人们要在二月二晚上落下高悬了整个正月的红灯,叫做“落天灯”。

中华民族是十分讲究时间伦理的民族,对标志起始的时间格外重视,也赋予更高的价值。所以在清朝以及民国时期的许多地方,在这一天孩子要去上学,开笔取兆;农民要起农作,择田试犁;打活的长工也开始上工,主家则会备好酒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和睦相处,互助互济。



先锋吹奏

浙江磐安吹打——散落在山乡的古乐

王海根

在浙江磐安的大街小巷、庙宇祠堂,每有节庆,那古朴、浑厚而热烈的吹打便响彻磐安山乡,这就是从久远的年代传承至今的山乡古乐——磐安吹打,包括四吹、先锋吹奏、铜锣调等在当地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目前,该项目已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吹流行于磐安县深泽乡一带,属丝竹锣鼓乐,因由锦锣道、风入松、桂枝香、望乡台4首曲牌组合而得名,其乐器有箫、曲笛、京胡、板胡、扬琴、琵琶、月琴等,种类繁多,且别具特色。乐队编制少时24人,多时36人,队伍庞大。四吹演奏常在春节前后开展,最初为祭祀祖先而设,特别是在祭祀“胡公大帝”时,必定吹奏。“胡公大帝”即北宋清官胡则,他为民请命,曾免去浙西一带百姓姓丁钱,深受百姓拥戴,身后被立庙祭祀,尊称为“胡公大帝”。每逢“胡公大帝”忌日,四吹乐队都要沿着各村行奏。行奏是四吹乐队的一大特色,排着长长的队伍,边走边演。演奏人员的服饰也很特殊,一律头戴红缨帽,身穿白长褂,腰捆扎包,分插两把匕首。这是因为“胡公大帝”生前是朝廷重臣,着此装以示崇敬。近年来,四吹的表演形式有所改革,队形和服装更适应于舞台表演,因此现在四吹演奏也广泛运用于助兴演出。

先锋吹奏与四吹一样,也是起源于祭祀“胡公大帝”。磐安深泽乡每年都要举办庙会祭祀“胡公大帝”,参演队伍前要有8支或16支先锋吹奏开道。这种形式一直流传至今,现已发展到36人的队伍,声势浩大。他们吹奏的乐器“先锋”,又称“长号”,铜制,分3节,能伸缩,伸直后达180厘米。吹奏起来有一定难度,没经过训练一般吹不响,只有掌握正确的运气方法,才能吹得嘹亮高亢。当地的整团在开场前也都要先吹奏三声“先锋”,没有“先锋”的前奏,乐曲不得往下演奏,这也是此乐器为何被称为“先锋”的原因。先锋吹奏队形有“八字形”“一字形”等,样式多样。表演时队员着统一橙黄色服装,煞是好看。

关于铜锣调的产生,当地流传着一段传奇的故事。明万历年间,磐安县安文镇山头村有位叫陈进的人,号旭初。此人才智过人,深谙管弦。某年夏天当地遭遇大旱,旭初洗净身持斋,独自一人来到他首募捐建的“三姑小庙”求雨,梦中闻得一首曲子清心悦耳,醒后就用木炭将梦中所闻之曲记下来,并演奏给全村人听,大家听后异口同声说“优美之极”。有人提议,此曲来自天上,应叫《天曲》。《天曲》不仅好听,还能给人们带来甘露,为感谢天恩,当地百姓决定自第二年每年吹奏《天曲》,此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其乐队编制为笛子、京胡、板胡、二胡、吉子(唢呐)、小鼓、小鼓及主角大小铜锣等。铜锣调在磐安各地均有分布,主要流传在深泽乡、墨林乡一带。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每逢婚丧嫁娶或是喜庆节日,磐安人几乎都要用到磐安吹打,它已经深深扎根民间,成为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东南欧非遗中心在索非亚开放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王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东南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近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落成开放。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也是欧洲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保加利亚的有关官员出席了开放仪式并剪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们日益感受到文

化趋同性带来的压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有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各地的传统。保加利亚文化部部长拉希多夫说,东南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将由保文化部、外交部和科学院共同管理,该地区国家可自愿参与中心建设并缴费,用于中心的日常运转。

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日本、韩国、秘鲁和阿尔及利亚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

歙县学生踊跃报考非遗专业

本报讯 在安徽歙县今年的职业学校春季招生中,徽雕等非遗专业备受学子青睐。

在安徽省行知学校的招生现场,该校的徽雕艺术、徽州古建、徽派盆景等非遗专业吸引了大量学生,家长前来咨询。余梦华同她的孪生妹妹打小就对乡间精美的徽州古建、雕刻艺术痴迷,当得知行知学校开设有徽雕艺术专业,她们就一起报名了。余梦华说,仅她的同学中就有6人前来报名。

行知学校校长助理江晓晖说:“这几年社会各界对非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校自开设非遗专业以来,前来报名的学生愈来愈多了,非遗专业受青睐,这让我们十分欣喜。”(安文)

让台湾民众领略北京非遗风姿

本报讯 “2012两岸城市文化互访系列——北京文化周”近日在台湾举办,其中“燕京绝技——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在台北松山文化创意园区率先登场。

该展览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首次大规模在台湾展出,从不同层面集中展现了古都北京传统文化中的皇家气韵和市

井民生。景泰蓝、面塑、皮影、蒙镶、宫灯、绢人,以及老北京的吉祥物兔儿爷等20余个非遗项目的200件作品一起亮相,王鹏、时雅莉、汤凤国等14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了古琴、药香、面塑等非遗传统制作工艺,并有抖空竹技艺表演和现场互动环节等,让台湾民众近距离领略了北京非遗的风采。(钟辛)

铁毫此处见琴心

记定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文增

薛志宏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位于今天的河北曲阳。自唐代开始,定窑便在曲阳兴起,至北宋盛极一时,到元代定窑毁于战乱,定窑烧制技艺也几近失传。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技艺才逐渐得以恢复发展,千年定窑终于重放光彩,这其中离不开一个人的贡献,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总监——陈文增。

艰辛求索:30余年寻一梦

陈文增1954年生于河北曲阳。曲阳古属定州,历史悠久,定窑虽早已变成一处历史遗迹,但似乎仍在向世人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家乡的文化给了陈文增无穷的滋养,从儿时起,他就经常徜徉于定窑的遗址废墟中,想象着如何把一团泥土变成精美的瓷器。

1978年,陈文增进入河北省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制瓷工人。尽管工厂效益不好,生产研究条件也比较差,但对定瓷的研究仍让他痴迷。其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让陈文增记忆犹新:一天,经过两个多月通宵达旦的工作,他终于完成了一件新产品的造型装饰设计,这时他才猛然想起那天是自己大喜的日子,于是匆匆骑车往家赶,而此时家人及宾客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陈文增是一位学者型的工艺美术家。他认为,学术探索、学科建设是工艺美术得以发展的支撑,并在这条道路上孜孜以求。2003年,他的45万字的《定瓷研究》出版,填补了定瓷在理论建设上的空白。2008年,他的第二本著作《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出版,清华大学教授有了神韵,常用的双线纹样把定窑装饰得高贵典雅。但双线纹样是如何在瓷器表面实现的,历来专家们有“刻一刀复一刀”的看法,但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瓷

器永远无法与宋代瓷刻花制品相媲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文增不厌其烦地对定窑刻花瓷片进行研究和实验。终于,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陈文增得出定瓷双线纹样是“一刀双线”的结论,“必须在胚胎半干不湿的状态下,一口气呵成,下笔前需胸有成竹”。同时,他还研制出单线刀、双线刀、组线刀3种刻花刀具,并提出“刀行形外,以线托形”的刻花理论。定窑刻花艺术的成功研制揭开了千年定瓷的神秘面纱,被业界称为“破译宋代定瓷密码的开始”,陈文增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30年的不懈奋斗终于结出累累硕果,如今,陈文增已拥有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等数十项荣誉,但他对这些淡然处之,仍醉心于定瓷的研究、保护和传承。

陈文增是一位学者型的工艺美术家。他认为,学术探索、学科建设是工艺美术得以发展的支撑,并在这条道路上孜孜以求。2003年,他的45万字的《定瓷研究》出版,填补了定瓷在理论建设上的空白。2008年,他的第二本著作《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出版,清华大学教授有了神韵,常用的双线纹样把定窑装饰得高贵典雅。但双线纹样是如何在瓷器表面实现的,历来专家们有“刻一刀复一刀”的看法,但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瓷

之处,为从事陶瓷创作设计和工艺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应该说其理论总结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

更上层楼:一家融会瓷诗书

陈文增认为,艺术是相通相融的,他以瓷器为载体,让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艺术与制瓷技艺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其独创的“三联艺术”是一大创新,不但使瓷、诗、书三者相辅相成,而且大大提高了定瓷的文化品位。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定窑刻花也是线条的艺术,二者具有同工之妙。陈文增自小酷爱书法,40多年研习不倦。在艺术实践中,他把书法和定窑制作融为一体,“定窑手刻花纹用刀,细察起来近似中国画和书法的用笔。书法讲究欲左先右,欲上先下,逆锋落笔、回锋收笔。刻花刀法同样讲究横落竖行、竖落横行、露锋侧入、藏锋直入,以及出锋轻提、回锋重按等”。就这样,书法与定窑艺术在其“刀下”交相辉映,让定瓷增添了许多雅趣。

诗言志,词言情,陈文增的诗词创作源自内心,铭于定瓷之上。其咏瓷诗“纵横跌宕意可寻,入草惊蛇鸟出林。吴带曹衣君莫恃,铁毫此处见琴心”,写出了高超娴熟的定窑制作工艺,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儒雅、多情的情感世界。其贵妃瓶上的题诗“时光掩过几番秋,玉韵何曾失自柔。史

笔情怀达万种,芳馨一段记风流”,借古咏今,警世警人,赋予了艺术品厚重的文化内涵。

文化传承:愿作春泥更护花

“大师必须带学生,不带学生的大师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大师;而大师的学生必须有所建树,成为后来的大师,否则大师之冠便失去光彩。”这是陈文增对人才培养的态度。在他的带领下,只有40人的曲阳定瓷有限公司竟然走出3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两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被外界称为“出大师、专家的地方”,人们说:“跟陈文增干,不成才都困难。”

人才是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和人文内涵延续的主体,人才培养是传统工艺美术得以保护发展的第一要素。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传统工艺美术面临生存危机,人工艺绝的现象并不鲜见。作为定窑传统烧制技艺的传承人,陈文增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为此他倾尽心血培养学生,建立了文化型大师创作队伍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徒授艺的传承机制。曲阳定瓷有限公司规定,有中级职称以上资历的人可享受每年7至10天的外出写生休假。公司还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对不同人才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各生产部门负责人专业技能培训,并通过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参加行业部门研修班、邀请专家授



陈文增

课及院校委培等模式,培养人才的综合素养,以建立公司的人才梯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对自己的学生,陈文增严格要求自己难以接受,但他又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学生,每每看到学生取得进步时,都从内心深处感到欣慰。现在,其弟子庞永辉、韩庆芳等已崭露头角,成为业界有名望的中青年专家,他们的成绩都凝结着陈文增的心血。

一路风雨,一路拼搏。在攀登定窑艺术高峰的道路上,陈文增付出很多,收获很多,但他从没停下探索的脚步,因为定窑艺术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是他一生的追求。